社会学经典著作

狂热分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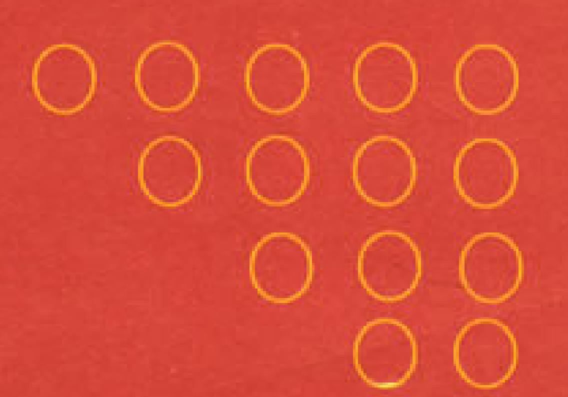
码头工人哲学家的沉思录

[美] 埃里克·霍弗 著
梁永安 译

The True Believer

Thoughts on the Nature of Mass Movements







他们又拿石漆当灰泥。

——《圣经·创世记》第11章

目 录

第一章 不受欢迎者在人类事务中扮演的角色

- 一个群体的性格和命运，往往由其最低劣的成员决定
- 心怀不平者

第二章 穷人

- 今日西方世界的工人视失业为一种堕落
- 为最起码生活操劳的人，不会有时间、心情去悲愤或造梦
- 悲愤会在它几乎得到补偿的时候最为蚀骨
- 拥有而后不满
- 奢侈品与必需品
- 盼望那看不见的，就必须忍耐等候
- 自我若是软弱无力，再多的自由又有何用？
- 狂热者对自由的恐惧尤甚于迫害
- 最大声呼吁自由的人，往往是最不乐于住在自由社会里的人
- 少数人的热望
- 随着个人创造力的衰退，人们参与群众运动的倾向显著增加
- 分崩离析的家族、部落或国家
- 兴起中的群众运动对家庭都会抱持敌意态度
- 被统治者融合在一个整体中的程度愈深，个人落寞的情绪愈少
- 把失意者融化到一个紧密无间的集体中
- 瓦解中的集体结构是群众运动萌芽的最佳环境

第三章 畸零人

- 暂时性的畸零人
- 永久性的畸零人

第四章 极端自私的人

- 极端自私的人往往是无私精神最勇猛的捍卫者

第五章 面对无穷机会的野心者

- 面对无穷的机会时，无可避免会看不起现在

第六章 少数民族

- 在一个行将被同化的少数民族里，最容易被群众运动吸引的，是最有成就和最没成就的两类人

第七章 烦闷者

- 在蠢动不安中，人们为改变现状者鼓掌叫好

第八章 罪犯

- 爱国主义是歹徒的最后归宿

第三部分 团结行动与自我牺牲

第一章 前言

- 无论团结还是自我牺牲精神都需要以自轻为前提

第二章 促进自我牺牲精神的方法

- 当代群众运动的反个人主义偏执
- 通过认同，个人不再是他自己，而成了某种永恒之物的一部分
- 铁幕兼具物理性与心理性的作用
- 通过游行、检阅、仪式和典礼之类的活动，群众运动可以引起每一个心灵的共鸣
- 群众运动给自己设定很多不切实际的目标，乃是其对抗「现在」的策略
- 希望一丧失，人群就会分裂
- 「忠实信徒」会把自己视为某种向前和向后无限延展的东西的一部分
- 适应良好的人都是差劲的先知
- 先知们都是集反动派与激进派于一身的人
- 愈做不好一般事情的人就愈胆大妄为
- 渴望而非拥有，才是人们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的动力
- 自我牺牲的动力不可能是出于任何具体利益的考虑
- 任何有效的主义，必须是「违反天性、违反常识、违反欢乐的」
- 教义不是让人去理解的，而是让人去信仰的
- 忠实信徒胆敢从事史无前例或不可能的任务
- 摆脱「自我」的冲动也是一种摆脱理性和显而易见事实的冲动
- 煽动激情可以有效推翻一个人与其自我间的平衡
- 狂热者无法被说服，只能被煽动
- 宗教狂热者的对立面不是狂热的无神论者，而是温和的愤世嫉俗者
- 在狂热者看来，宽容是一种软弱、轻浮和愚昧的象征
- 典型的将领知道怎样镇压群众，却不知道怎样战胜他们

第三章 团结催化剂

- 群众运动不需要相信有上帝，却不能不相信有魔鬼
- 共同的仇恨可以凝聚最异质的成分
- 一个理想的魔鬼
- 恨是最有力的凝聚剂
- 恨意源于自卑
- 恨或宽大为怀
- 让罪疚意识不发声
- 强烈的罪疚感
- 每一个群众运动都会按照它选定的魔鬼形象来塑造自己
- 大混乱就像坟墓一样，是平等的温床
- 炽烈的恨意可以给空虚的生活带来意义和目的
- 仇恨是一种普遍存在于我们各种情感混合物的一种成分
- 舍弃自我的人极容易产生各种激情，其中包括仇恨的激情
- 模仿是重要的团结催化剂
- 排斥自我
- 优越感可以抵消模仿心理
- 忙人比闲人更易于去模仿
- 具有紧密集体制的原始人要比崩溃中的公社与部落组织更易于现代化
- 宣传家只能使群众信仰他们「已知」的事情
- 我们愈有理由内疚，我们的宣传就愈狂热
- 狂热可以带来暴力，暴力也可以孕育狂热
- 征服与说服手段相伴而行，而后者往往是前者的借口和工具
- 热烈的信仰可以有效发挥暴力
- 理论与实际愈是矛盾的群众运动，就愈是热衷把自己的信仰加诸别人
- 领袖要等到时机成熟才能扮演他们的角色
- 一个领袖最神秘的能力之一，与其说是能掌握群众，不如说是能控制甚至魅惑一小群能干之士
- 领袖必须是个务实者和现实主义者，但说起话来又得像个梦想家与理想主义者
- 「忠实信徒」的行为不管多么粗暴，他基本上都是一个恭顺服从的人
- 失意者乐于以独立性来交换免于做决定的自由
- 顺服于一个领袖不是实现目的的手段，而是目的的实现本身
- 在自由社会，一个领袖与其说是领导人民，不如说是追随人民

- 没有撕去自己特殊性和分化性的人会难以投入行动
- 行动人之间的「国际」
- 失意者把行动视为医治他们烦恼痛苦的良方
- 成功的行动往往会带来自身的终结
- 群众运动广泛使用猜疑作为一种统治机制
- 相互猜疑可以带来相互恐惧，后者会像一个铁环套那样把大家紧紧套在一起
- 「忠实信徒」永远不会觉得完整，永远不会觉得安全
- 献身乃是个填不满的无底洞

第四部分 始与终

第一章 言辞人

- 言辞人可以在不知不觉中动摇既有的体制，削弱当权者的威信
- 造就法国大革命的是虚荣心，自由只是借口
- 一个体制明明无能已极却能够苟延残喘时，当权者已经与言辞人结成紧密同盟
- 所有当代的群众运动千篇一律都是由诗人、作家、历史学家、学者、哲学家之类的人为其前导
- 优秀者信仰尽失，而低劣者激情澎湃
- 催生群众运动的知识分子的悲剧根源在于，他们本质上都是个人主义者

第二章 狂热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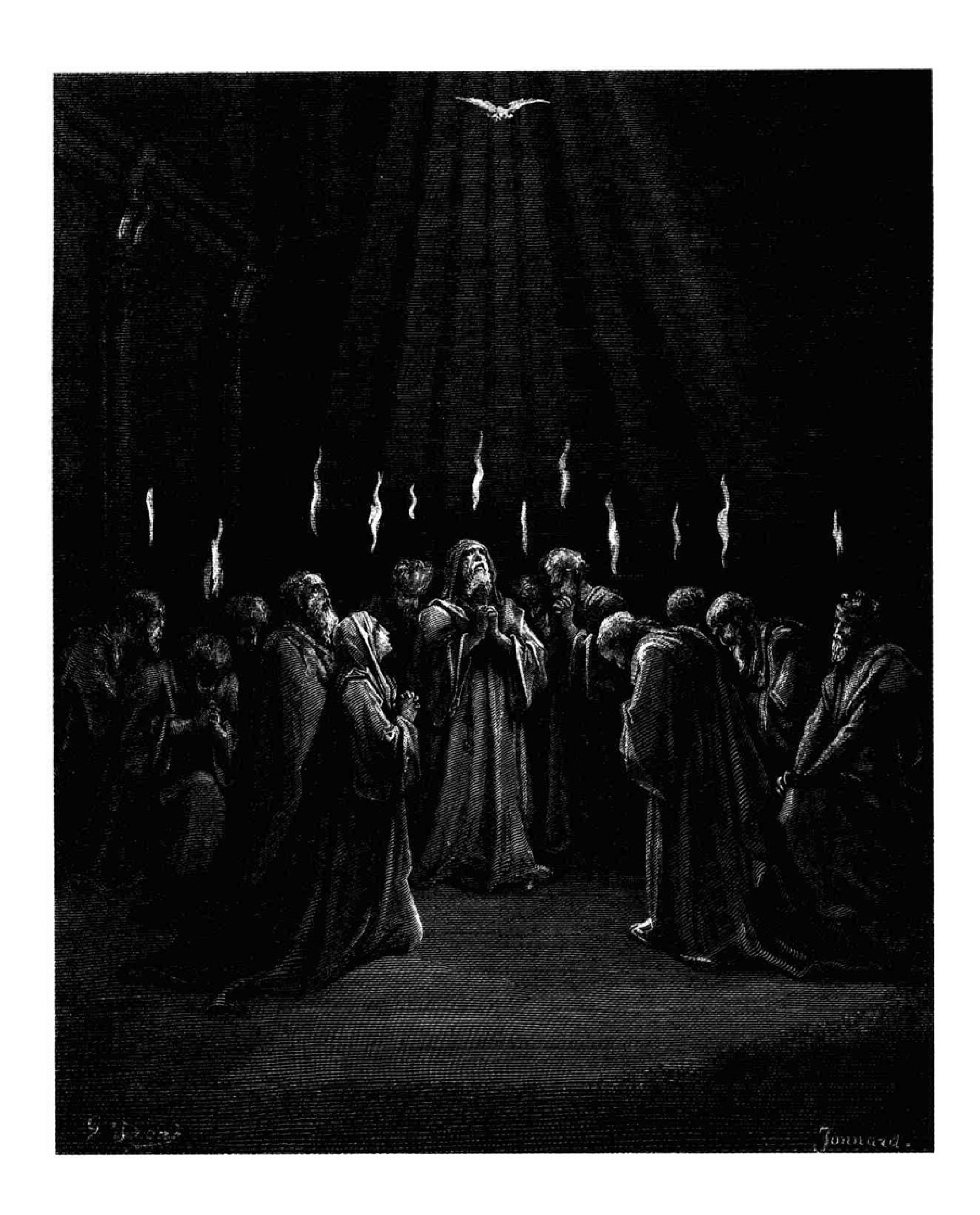
- 如果狂热者是鱼，混乱就是水
- 大部分的纳粹头子都有艺术和文学上的野心，却没贫实现的能力
- 没有外敌可以摧毁时，同一阵营的狂热者就会彼此为敌

第三章 务实的行动人

- 用失意者的愤懑情绪作为建筑一个新世界的灰泥
- 真正的行动人意不在更新世界，而在拥有它
- 行动人用以巩固和维系新秩序的方法是折衷性的
- 一个群众运动的活跃阶段结束，就会变成成功者的权力工具和失意者的鸦片

第四章 良性与恶性的群众运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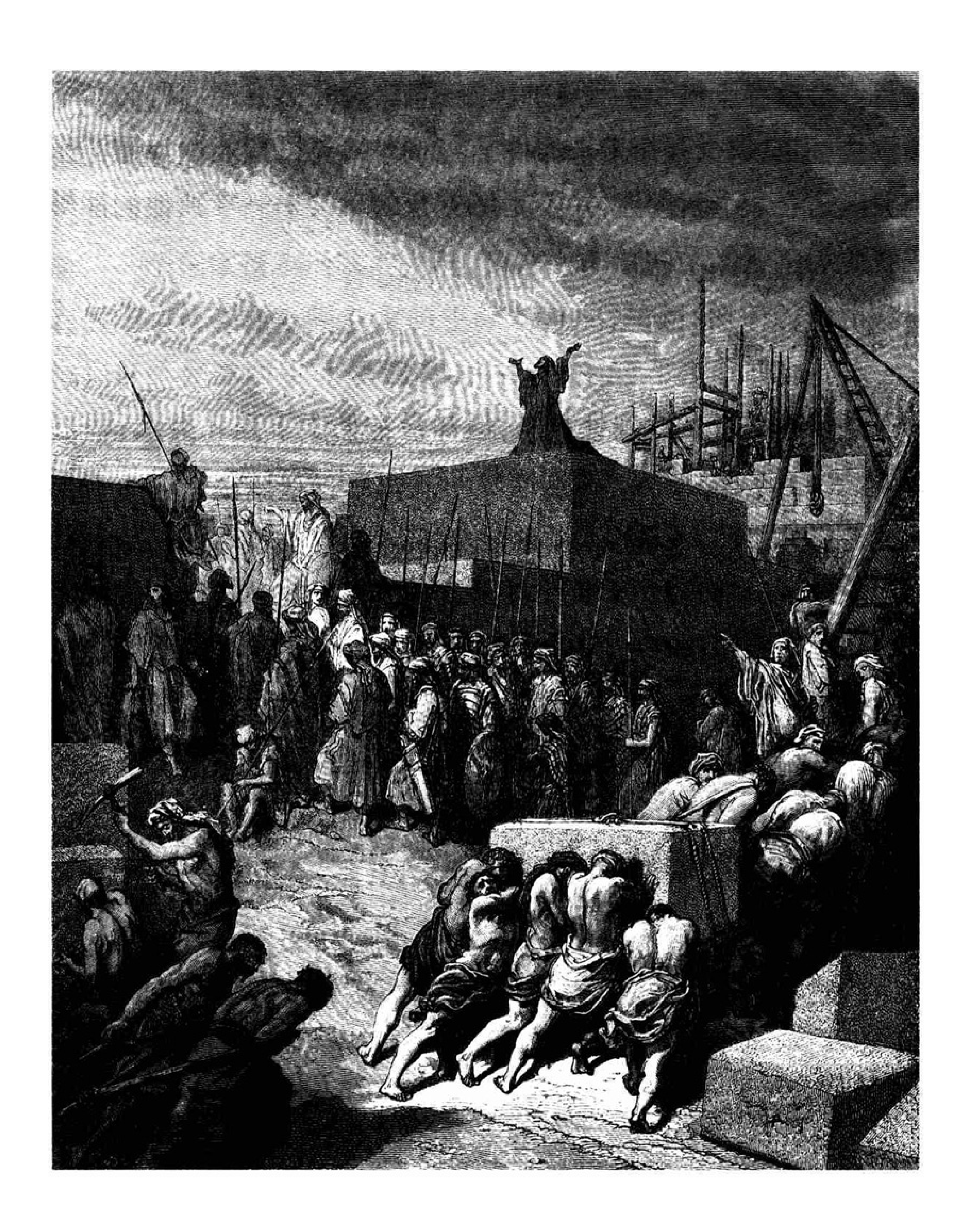
- 在社会激情处于高压的阶段，少有可供人沉思和反省的余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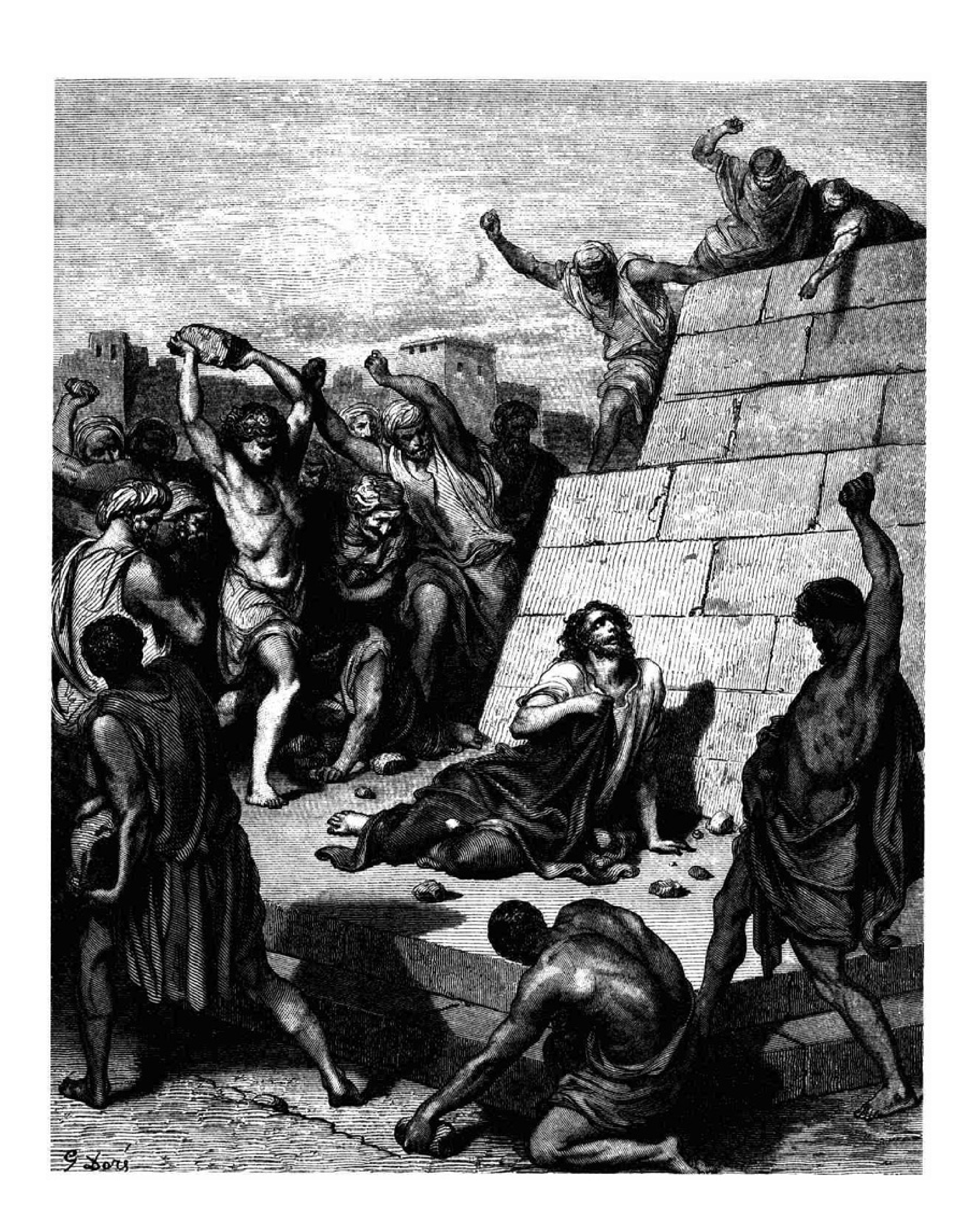


第二部分

潜在的皈依者






G. Doré

极端自私的人特别容易有失意感。一个人愈自私，失望时就愈难熬。因此，极端自私的人往往是无私精神最勇猛的捍卫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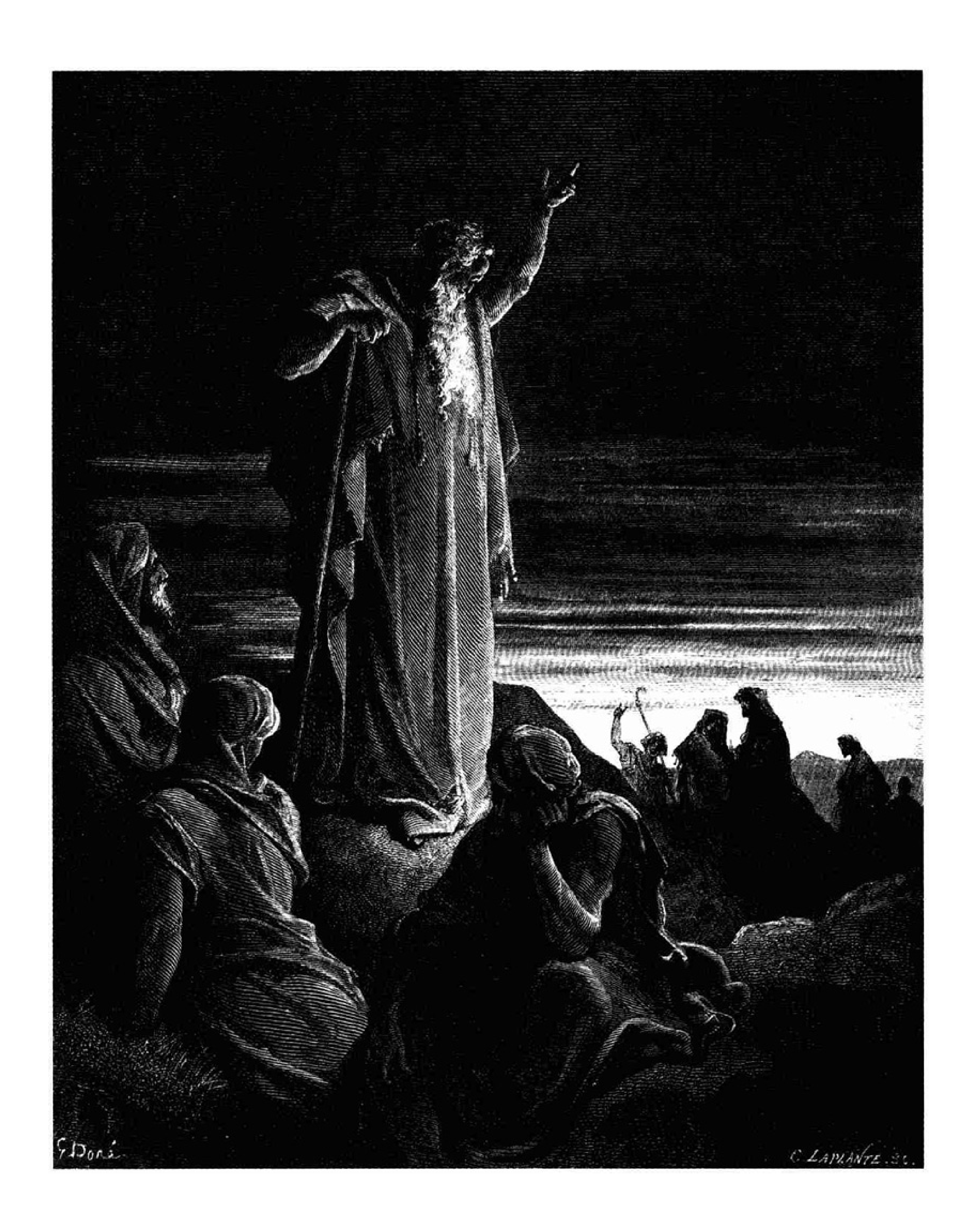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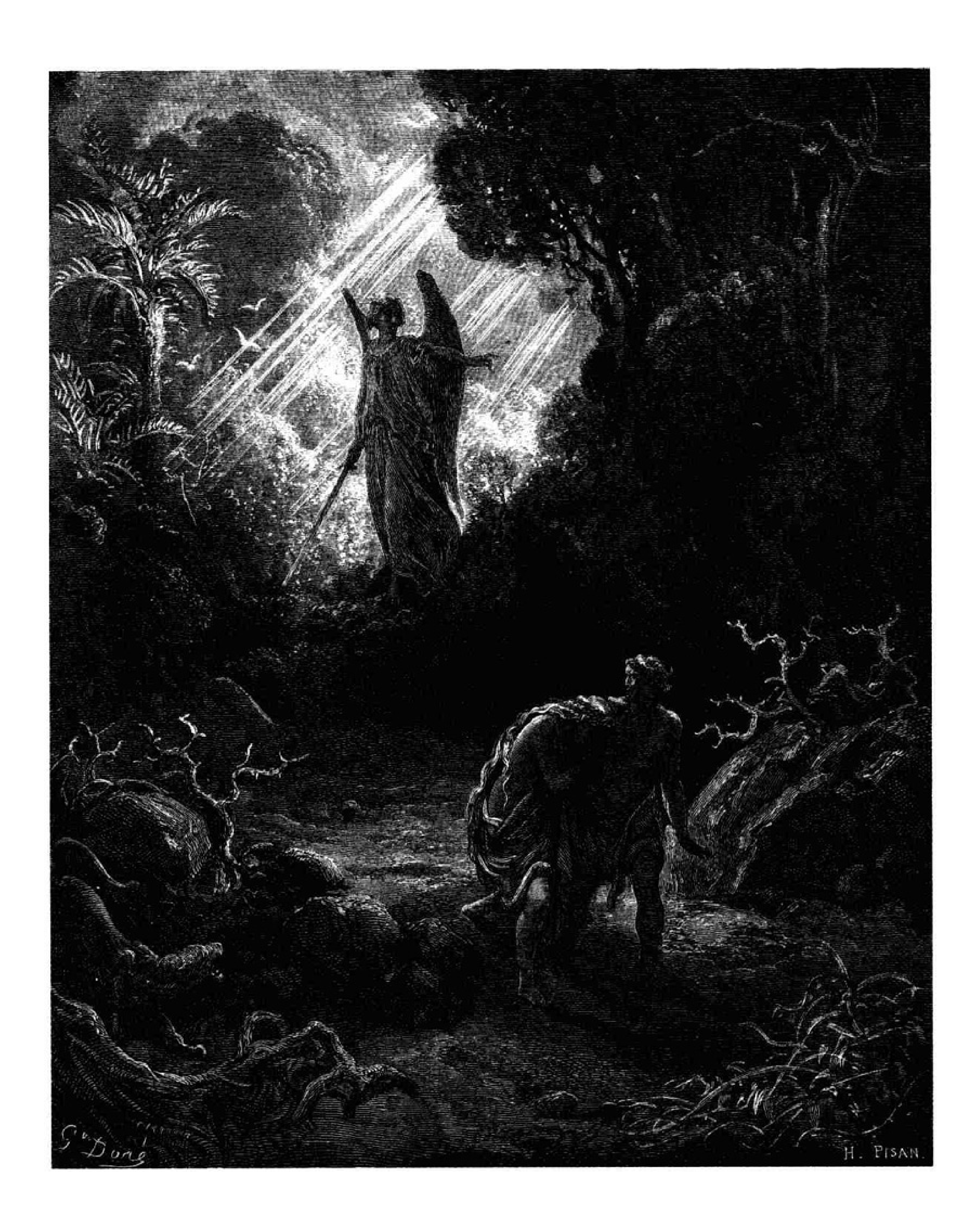
极端自私的人特别容易有失意感。一个人愈自私，失望时就愈难熬。因此，极端自私的人往往是无私精神最勇猛的捍卫者。

最凶暴的狂热者，往往是一些本来自私但却出于某些原因（内在缺陷或外在环境）而被迫失去对「自我」的信仰的人。于是，他们不再把高明的利己手段拿来服务其无能的自我，转而用于服务一件神圣事业。但即便他们信奉的是一种鼓吹爱与谦卑的宗教，他们既不会去爱，也不会谦卑。

机会无穷就像机会稀少或缺乏一样，可以是失意感的有力来源。当一个人面对无穷的机会时，无可避免会看不起现在。他会想：「我现在所做或可以做的一切，与我所未做的事相比，就像小钱那样微不足道。」

机会无穷就像机会稀少或缺乏一样，可以是失意感的有力来源。当一个人面对无穷的机会时，无可避免会看不起现在。他会想：「我现在所做或可以做的一切，与我所未做的事相比，就像小钱那样微不足道。」这种失意感特别容易萦绕淘金者和荣景时代的浅狭心灵。正因为这样，一件乍看怪异的事实就产生了：淘金者、掠地者和追求一夕致富者这些明明是最自利的人，往往极乐于表现自我牺牲精神和参与群体行动。基于这个缘故，面对无穷机会的人要比那些选择有限、只能过按部就班生活的人更能接受爱国主义、民族团结甚至革命的宣传。


G. Doré
C. LAPLANTE. Sc.


H. PISAN.

第三部分

团结行动与自我牺牲

第一章 前言

无论团结还是自我牺牲精神都需要以自轻为前提。为了成为一个紧密团体的一分子，个人得抛弃许多东西。他必须放弃隐私，不能有个人意见，也往往不能有个人财物。因之，每一种促成团结的工具也是促进自我牺牲精神的方法，反之亦然。

043 | 无论团结还是自我牺牲精神都需要以自轻为前提

一个群众运动的活力系于信徒的团结一致、勇于自我牺牲。当我们把一个群众运动的成就归功于它的信仰、主义、宣传、领导或冷酷无情时，我们触及的只是它们赖以促成团结和自我牺牲精神的方法。除非我们能认识到它们孜孜以求的，是培养和巩固团结与自我牺牲的精神，否则就难以了解群众运动的本质。如能知道培养这种精神的过程，我们就能掌握群众运动的特性与策略的内在逻辑。除少数例外[1]，任何群体或组织要是试图建立紧密一体性的群体或组织，一般都会展现出一个群众运动的特点（包括高尚与卑下的方面）。反之，在承平时期，一个民主国家是自由个人间的制度性联结。然而，一旦碰到危机，当这个国家的生存备受威胁，它就会想办法加强团结，鼓励人民准备好自我牺牲；这些时候，它几乎总会表现出若干程度群众运动的性格。宗教和革命组织也是同样情形：它们能否发展为群众运动，起决定作用的不是主义或纲领，而是它们把多少心思花在创造团结和自我牺牲的精神上面。

要强调的是，沉重的失意者会自然而然产生集体行动和自我牺牲的倾向。因此，如果能够得知这些倾向为何会自发于失意者身上，我们就可能得知这些倾向的性质，以及有什么人为方法是可以刻意培养这些倾向的。「失意者」的苦恼何在？在于他意识到其自我已败坏得无可补救。他们的主要渴望是逃避自我——正是这种渴望让他们倾向于集体行动和自我牺牲。厌恶有缺点的自我，遗忘它、摆脱它的冲动，同时会让人愿意随时自我牺牲和把自己掩埋在一个紧密的集体中。换言之，失意感不但会让人产生团结和勇于牺牲的渴望，甚至会创造出让这样的事情实现的机制。如下所示，鄙视「现在」及易于仇恨、模仿、轻信等等萦绕强烈失意者的性向情绪，乃是团结的催化剂和无所顾忌行动的促成者。

以下的第44到103节将试图显示，当我们要诱导一群人产生团结行动和自我牺牲的精神时，我们会竭尽所能——不管我们自觉与否——鼓励他们疏离「自我」，努力在他们身上培养出失意者（失意者是主动疏离「自我」的人）会有的各种态度和冲动。简单来说，我们是要

试图显示，一个积极群众运动的主要策略，是在其追者中间诱导培养一种失意者的心理和行为倾向。

料想得到，读者对这部分的论点一定会有许多异议。他会觉得；有好些事情被夸大了，而有好些事情被忽略了。但本书并不是一部权威性的教科书。它是一部思考之书，并不避讳提出一些片面的真理，因为有时片面的真理也可以开辟新的思路，帮助架构一些新的问题。白芝浩（Bagehot）说过：为了阐明一条原理，你必须夸大很多事情而又略去许多事情。

团结行动的能力和自我牺牲的精神看来几乎总是形影不离的。我们若听说一个团体的成员完全置死生于度外，就可想见他们的关系必然十分紧密团结。[2]同样地，如果我们碰到一个紧密团体的成员，猜他是个视死如归的人往往八九不离十。无论团结还是自我牺牲精神都需要以自轻为前提。为了成为一个紧密团体的一分子，个人得抛弃许多东西。他必须放弃隐私，不能有个人意见，也往往不能有个人财物。因之，每一种促成团结的工具也是促进自我牺牲精神的方法，反之亦然。不过，在接下来的各节，为了论述的清晰起见，我们还是会把两者分开来讨论。但是，我们不应忘了它们只是一体的两面。

于此不妨简述第44至63节的大纲，它们谈的是促进成员自我牺牲精神的方法。

想要培养出人们随时准备好战斗和赴死的心态，诀窍在于把个人从他的血肉之我（flesh-and-blood self）分离出来。有几个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把他彻底同化到一个紧密的团体（第44至46节）；赋予他一个假想的自我（第47节）；灌输他一种贬抑「现在」的态度（第48至55节）；在他与真实世界之间架设一道帷幕（第56至59节）；通过诱发激情，阻止个人与其自我建立稳定的平衡（第60至63节）。

【注释】

[1]　见第64节论军队的部分。

[2]　「在北美洲的印第安人中，那些最有团结感的部族是最好战的。」引自W. G. Sumner, War and Other Essay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11), p. 15.

第四部分

始与终

第一章 言辞人

能为一个群众运动做好铺路工作的，是那些善于使用语言和文字的人；但一个群众运动要能实际诞生出来和茁壮成长，却必须借助狂热者的气质与才干；而最后可以让一个群众运动获得巩固的，大半是靠务实的行动人。

104 | 言辞人可以在不知不觉中动摇既有的体制，削弱当权者的威信

群众运动一般都是在现行秩序信用扫地以后才会出现。但一个秩序会名誉扫地，更多时候不是它犯了大错或滥施暴虐致之，而是心有不平的言辞人（men of words）[1]积极促成的。如果一个地方缺乏言辞人，或这些言辞人心中没有不平，现行政权再无能和腐败，也可能会继续掌权，直到自行倾坍圮崩溃为止。另一方面，一个体制即使有再多美德和活力，如果它争取不到言辞人的效忠，一样有垮台之虞。[2]

正如我们在第83和86节指出过的，一个群众运动的实现和延续都需要暴力。一个如火如荼的群众运动是一种冷酷无情的事业，其操控者是一些冷酷无情的狂热者，他们借助文字言说，只是为了让他们靠强制手段得来的归顺看似出于归顺者自发。但这些狂热者只有在现行秩序已经信用破产、不再得到群众拥护时，才可能乘虚而入，掌握权力。在这之前，动摇既有体制权威和让群众产生求变之念的工作，只有受到公认的雄辩者和作家才能胜任。只要现行秩序大体还能运行，群众的基本态度就会是保守的。他们可能会想到改革，但不会想到全面革新。狂热的极端分子不管多么能言善辩，都只会使群众觉得他们危险、诡诈、不实际，甚至是疯子。群众不会被他们打动。列宁就了解到，在条件还没有成熟的地方，共产党员「会感到难以接近群众……甚至难以使群众听他们说话」[3]。此外，一个政权不管多软弱、多宽容，都极有可能会对狂热者的活动加以激烈还击，并从中获得新的活力。

但群众对典型言辞人的态度却截然不同。群众会愿意倾听他们的话，这是因为群众知道，不管言辞人的话多么激烈，都不会产生实时效果。当局要不是懒得管他们，就是只会用温和方法加以对付。正因为这样，言辞人可以在不知不觉中动摇既有的体制，削弱当权者的威信，使既有的信仰和忠诚弱化，从而为一个群众运动布置好舞台。

言辞人、狂热者和务实的行动人三者之间的分别，我们将在以下几节加以讨论。但这不是说他们的分别是绝对的。例如，甘地和托洛茨基起初显然都是只会用嘴巴的言辞人，但日后却成为卓越的领导者或将军。穆罕默德起初也是言辞人，但后来却成为死硬的狂热者，再

后来又蜕变为出色的行动人。列宁这个狂热者则同时是个言辞大师和罕见其匹的行动人。我们之所以把三者加以区分，只是为了说明一件事情：能为一个群众运动做好铺路工作的，是那些善于使用语言和文字的人；但一个群众运动要能实际诞生出来和茁壮成长，却必须借助狂热者的气质与才干；而最后可以让一个群众运动获得巩固的，大半是靠务实的行动人。

在本来没有言辞人的地方出现了一小批言辞人，本身就是迈向革命的一大步。西方列强会在亚洲间接和无意中孕育出一些群众运动，除了因为它们点燃了亚洲人民的仇外情绪（见第1节），也因为它们出于慈善目的而建的教育机构培养出一些言辞人。很多印度、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革命领袖，都曾经在保守的西方学校读过书。贝鲁特的美国学校——它是由一些敬神畏天的保守美国人资助和主持的——就是孕育阿拉伯世界革命者的温床。另外，中国那些教会学校的老师，毫无疑问亦是在不自知的情况下，为中国的革命做了铺路的工作。

105 | 造就法国大革命的是虚荣心，自由只是借口

言辞人分为许多种不同的类型。他们可以是教士、先知、作家、艺术家、教授、学者或一般的知识分子。在中国，读书写字是一项艰难技艺，只要是读书人都可居于言辞人的地位。同样的情形见于古埃及，识读图形文字只是少数人的专利。

不管是哪一类型的言辞人，差不多都有一种深切的向往：被肯定。这种向往决定了他们对现行秩序的态度。拿破仑说过：「造就法国大革命的是虚荣心，自由只是借口。」每一个知识分子的内心深处都有一种无可救药的不安全感。哪怕是最有天分最多产的作家，都会过着一种不断自疑的生活，需要每天生产出新作品来自我肯定。雷米萨（de Rémusat）对梯也尔（Thiers）[4]的评论大概适用于所有言辞人：「他的虚荣心要多于雄心；他喜欢别人尊重多于服从，喜欢得到权力的表象多于权力本身。你可以常常请教他，然后照自己的意思做。他会看到你的恭顺多于你的实际行为。」[5]

几乎每一个喜欢找茬的言辞人，一生中都有一个阶段，在位者只要表现出谦恭和怀柔姿态的话就可以把他争取过去。处于这个阶段的言辞人大都会乐于当趋炎附势者和朝臣。要是当权的法利赛人曾经礼

贤耶稣，称他为拉比，以恭顺态度聆听他说话，那耶稣说不定就不会去宣扬一种新福音了。如果路德早早得到主教职位，从事宗教改革的热忱也许就会冷却。普鲁士政府要是授予年轻的马克思一个头衔和重要政府职位，说不定可以把他争取过来；拉萨尔（Lassalle）[6]的情形大概也是如此——送他一个头衔和一袭官服也许就可以得到他的效忠。不过，等到一个言辞人完成自己的一套哲学或主义之后，他就不容易会动摇，不容易受奉承和引诱影响。

不管一个抨击当局的言辞人，多么相信自己是为被压迫者和受伤害者仗义执言的斗士，他的动机十之八九都是私人和个人性的。他悲天悯人的态度通常都出于对当权者的憎恶。[7]罗素说过：「只有极少数和极例外的人会具有对全人类的爱，以致无法忍受大众的不幸和痛苦——不管这种痛苦跟他有没有切身关系。」[8]梭罗以夸张的措辞道出同一个事实：「我相信，让一个改革家——哪怕他是上帝最神圣的儿子——如此悲伤的，不是同胞的苦难，而是他的私人隐痛。要是这种隐痛被拿掉……他就会道歉都不说一声就抛弃他的同志。」[9]

若是一个言辞人的崇高地位受到当权者恰如其分的承认，他往往会找出各种高尚理由来解释自己为什么会站到强者一边，打压弱者。例如，路德刚开始挑战天主教会时，曾对「贫穷、单纯、普通的大众」[10]寄予莫大同情，一旦得到德意志各诸侯的支持，他却宣称：「不管政府多么坏，上帝会宁愿忍痛让它存在下去，而不会容许暴民反抗，不管他们多么有理。」[11]受达官显贵礼敬的柏克（Burke）把人民群众称为「蠢猪似的大众」，并建议穷人应该「忍耐、勤劳、节制、俭朴和敬虔」。[12]在纳粹德国和俄国，被捧在手心的言辞人并没有冲动要站在受迫害者的一边，去谴责残忍无情的国家领导人和秘密警察。

106 | 一个体制明明无能已极却能够苟延残喘时，当权者已经与言辞人结成紧密同盟

每当我们看到一个体制明明无能已极却能够苟延残喘时，就可以断言，这个体制要不是完全没有读书人阶级，就是当权者已经与言辞人结成紧密同盟。如果所有读书人都是教士，那教会就是不可动摇的；如果所有读书人部是官吏，那现政权就不太容易会遇到反抗。

天主教会在公元10世纪教皇约翰十二世（John XII）主政时期坏到不能再坏，其腐败和无能要比宗教改革时期尤有过之。但在公元10世纪，所有有学问的人都是教士，反观在15世纪，因为印刷术和纸张的出现，读书识字不再是教会的专利。作为宗教改革先导的，正是非教士身份的人文主义者。至于那些与教会关系终密切的学者，或是受教皇礼遇的学者，他们「总的来说对既存制度——包括教廷滥用权力的现象——采取宽容态度，也绝少介意粗鄙的民众被弃置在迷信的黑暗中——因为他们自己能从这种黑暗中受惠」[13]。

就像古埃及一样，古代中国的稳定性是官僚系统与文人紧密结合的结果。反之，大清帝国唯一有力的群众运动——太平天国起事——则是由一个在科举中屡次名落孙山的读书人所发动。[14]

罗马帝国的经久不衰，部分是罗马统治者与希腊的言辞人协力合作的结果。被征服的希腊人觉得罗马的法律和文明，都是他们的。这就不奇怪，当邪恶变态的罗马皇帝尼禄——他是希腊文化的夸张仰慕者——在公元67年出巡希腊时，会受到希腊人歇斯底里的欢迎。他们打心底把尼禄看成一个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同侪。「为了使他高兴，他们把各种竞技都排在同一年中举行。所有城市都把他们在竞技中赢得的奖品转送给他。各个委员会继续等待着他，乞求他赏光造访和高歌。」[15]反之，尼禄也不吝赏赐希腊人各种特权，又赐予参加地峡运动会（Isthmian Games）的希腊人以自由人的身份。

在《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一书中，汤因比教授（A. J. Toynbee）引用亚历山大里亚的克劳迪安（Claudian of Alexandria）写成于恺撒征服埃及近500年后的一首歌颂罗马的六步诗后，怨叹说：「要证明君临印度的英国在很多方面都要比罗马帝国[对埃及]更仁慈和更开明并不难，但要在印度的任何地方找出一个克劳迪安却很难。」[16]但我想以下这个假设应该离事实不远：要是英国在印度不是只关心土王、大君的利益，而是也花过力气笼络知识分子，给他们平等待遇，分他们一杯羹的话，那英国人的统治说不定可以永远持续下去。可惜的是，统治印度的英国官员是任何地方的知识分子都不放在眼里的那类人。他们都是些行动人，习染了英国人生而优越的信念。他们一般都瞧不起印度的知识分子——既瞧不起他们知识分子的身份，也瞧不起他们印度人的身份。印度的英国人竭力把行动的领域保留给自己。他们从未认真培养印度人成为工程师、农学家或技术专

家。他们建立的教育制度志在培养「不务实」的言辞人。讽刺的是，这种制度不但没能维护英国的统治，反而加速其寿终正寝。

英国在巴勒斯坦的失败，部分也是因为典型的英国殖民官吏与言辞人之间缺乏友好关系。大部分的巴勒斯坦犹太人尽管强于行动，但因为教养和传统使然，本质上都是言辞人，也都是最受不得藐视和侮辱的。但英国殖民官吏却把他们看成一群怯懦和不知感恩的生事者，以为只要英国人一撤走，犹太人就会成为好战的阿拉伯人的俎上肉。犹太人也痛恨英国官员以指导者自居的态度，因为这些人在经验和智慧两方面都及不上犹太人。负责印度事务的英国官员要是换成赫胥黎（Julian Huxley）、尼科尔森（Harold Nicolson）或克罗斯曼（Richard Crossman ）一类的能士，大英帝国说不定就可以保住巴勒斯坦的治权。

不管是布尔什维克还是纳粹政权，显然都深谙言辞人对国家的极端重要性。在俄国，文人、艺术家和学者都分享到统治阶级的特权。他们全是高人一等的公仆。虽然要服从党的路线，但他们受到的束缚，并不多于精英分子。在纳粹德国，希特勒想要让精英阶级垄断一切知识的计划尽管邪恶，却不是有欠实际考虑的。在这个计划中，知识分子将会负责统治他预想中的世界帝国，而一般民众只会得到最起码的教育。

107 | 所有当代的群众运动千篇一律都是由诗人、作家、历史学家、学者、哲学家之类的人为其前导

在历史上导引过各个群众运动的言辞人中，18世纪的法国文人是我们最熟悉的典型。相似的模式也可从其他群众运动兴起前的阶段找到。例如，为宗教改革打好地基的，是那些撰写小册子挖苦和谴责教士阶级的人和罗伊希林（Johann Reuchlin）之类攻讦罗马教廷不遗余力的文人。基督宗教能够在罗马世界迅速扩张，部分是由于它想要取代的异教信仰早已名誉扫地。这种拆卸工作是由希腊哲学家做好的，他们讨厌古代信仰的幼稚，纷纷在学院和街衢上大肆抨击与冷嘲热讽。基督宗教在犹太教徒中少有收获，则是因为犹太教得到犹太言辞人的热诚效忠。拉比和他们的弟子在当日的犹太社会里享有崇高地

位。在言辞人对社会秩序有极高支配力的地方，没有任何让群众运动自内发展或由外传入的余地。

不管是社会主义还是民族主义运动，所有当代的群众运动千篇一律是由诗人、作家、历史学家、学者、哲学家之类的人为其前导。知识性理论家与革命性群众运动的关系不需要我来强调。

但同样重要的是，所有民族主义运动——从法国大革命到最近的印度尼西亚民族独立运动——都是由爱挑刺儿的知识分子而非行动人构想出来的。被认为是爱国主义支柱的将军、工业家、地主和大商家都是后来者，是到了群众运动风起云涌后才加入的。

在每一个民族主义运动的初级阶段，最必须投入力气去做的一件事，就是说服和争取上述那些爱国主义的未来支柱。捷克历史学家帕拉茨基（Palacky）说过，他和一小群朋友用餐，要是那个晚上饭厅的天花板垮掉了，就不会有捷克民族主义运动的出现。[17]这一小群「不务实」的言辞人乃是任何群众运动开始时不可缺的。

德国民族主义的催生者是德国的知识分子，一如犹太复国主义的催生者是犹太知识分子。言辞人因为极在意是不是被尊重，所以哪怕是他们所属的阶级或群体（种族上、语言上或宗教上的）受到羞辱，都会反应激烈。费希特（Fichte）[18]会起而呼吁四分五裂的德国统一，蔚为一个可以主宰欧洲的强权，正是受拿破仑对德国人（特别是普鲁士人）的羞辱所刺激。赫茨尔（Theodor Herzl）[19]会鼓吹犹太复国主义，则是因为目睹了俄国和欧洲其他地区数百万犹太人所受到的屈辱。某种程度上，那场把英国势力赶出印度的民族主义运动，乃是肇始于一个瘦巴巴、戴眼镜的印度人[20]在南非的一再受辱。

108 | 优秀者信仰尽失，而低劣者激情澎湃

那些爱吹毛求疵的言辞人是怎样通过持续的嘲讽和指责，来动摇政府威信和让大众兴起改变现状之念的，并不难想见。较不为人知的是，这个削弱政府威信的过程有时可以催生新的狂热信仰。好斗的言辞人「在探索现有秩序的根源以指出它缺乏法源与正义」[21]时，更多时候不是为一个自由社会铺路，而是为一个崇尚无比团结和盲从的集体铺路。广泛地鼓吹怀疑主义和不敬神往往会导致意料不到的结果。例如，文艺复兴是尊人抑神的，但它却成为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运

动的新狂热主义的一个前奏。启蒙时代的法国人努力暴露王室与教会的黑暗，宣扬理性与宽容，不料却引发革命和民族主义，其余波至今荡漾。马克思及其追随者攻击宗教、民族主义与重商主义不遗余力，却引发狂热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斯大林主义和主宰世界的激情。

这是因为，戳破一种狂热信仰或偏见的时候，我们并不会撼动狂热主义的根本。我们只是不让它从某一点跑出来，但结果很可能是让它从别的裂缝中冒出来。这样，好斗的言辞人在攻讦既有的信念与忠诚的同时，会无意中在幻灭的群众间创造出一种对信仰的饥渴。这是因为，大多数人无法忍受生活的贫乏无聊，除非是有某些东西可以让他们热烈献身，或有某种激情的追求可以让他们隐埋自己。所以，不管那些对现行政权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的言辞人初衷为何，他们都会成为一种新信仰的先驱。

真诚的言辞人不需要靠绝对的信仰活下去。他把探索真理的过程看得与真理本身同等重要。他不会排斥思想上的冲突，也乐意参与一来一往的论辩。要是他提出一套哲学或学说，那主要是为了展现才华和作为思想演练，而不是要把它作为行动纲领和信仰原则。固然，出于虚荣心，他们为自己的学说辩护时会相当凶猛，但他诉诸的原则一般都是理性而非信仰。狂热者和对信仰如饥似渴的群众则反是，他们更喜欢给思辨加上神圣的光环，使之成为一种新信仰的源泉。耶稣并不是基督徒，一如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总而言之，那些好斗的言辞人会通过以下几种方式为群众运动铺平道路：（一）攻击既有的信条与制度，使之威信尽失，不再受人民拥护；（二）在没有信仰就不能活的群众中创造一种信仰真空，以致一个群众运动起而宣扬某种新信仰时，幻灭了的群众会振臂相迎；（三）为新信仰提供主义与口号；（四）动摇「优秀者」——就是没有信仰也可以活下去的人——的信念，让他们在面对新狂热信仰的兴起时，没有抵抗的能力——因为看不出来为任何信念与原则捐躯是有意义的，他们会不作抵抗就向新秩序投降。[22]

一俟不敬神的知识分子把破坏工作完成，就会出现叶芝《基督再临》（The Second Coming）一诗中的情况：

> 优秀者信仰尽失，而低劣者
> 激情澎湃。

他们深信天启近在咫尺，
深信基督再临[23]指日可待。[24]

至此，可供狂热者表演的舞台已布置就绪。

109 | 催生群众运动的知识分子的悲剧根源在于，他们本质上都是个人主义者

一个群众运动的悲剧角色往往是为其前导的言辞人，又特别是那些活得够久，眼看着旧秩序为群众的行动所推翻的言辞人。

一般的印象是，群众运动（特别是革命）之所以发生，是因为群众下定决心要推翻腐化高压的暴政，为自己赢得行动、言论与良心的自由。这种印象是言辞人对现政权不断口诛笔伐所造成的。事实上，一个群众运动所体现的自由，一般都比它们致力要推翻的旧秩序来得少。[25]

对于这一点，论者往往作如下解释群众运动的领导者在关键时刻劫持了运动，作为自己登上权力宝座的工具，群众则受其欺骗，误以为自由即将来临。但这个解释是不对的。因为在群众运动的过程中，唯一被欺骗的只有言辞人。他们当初站起来对抗旧秩序，嘲笑它的不合理与无能，指责它的不合法和高压政策，要求它给予个人自我表达和自我实现的自由。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那些响应他们呼吁的群众，渴望的是和他们一样的东西。然而，群众渴望的其实不是自我表达和自我实现的自由，而是摆脱自主存在这个不能承受之重的负担的自由。他们想要摆脱「自由选择的可怕负担」[26]（陀思妥耶夫斯基语）。他们不想要良心的自由，只想要信仰——盲目、独裁的信仰。他们推倒旧秩序，不是为了创造一个由自由、独立的个人组成的社会，而是要建立一个整齐划一、没有个人性可言的完全统一体。旧政权让群众不满的不是它的邪恶，而是它的软弱；不是它的压迫性而是它无法把人们敲打成一个坚固有力的整体。言辞人打动群众之处不在于他们揭示出现秩序的卑劣，而在于揭示出它无可救药的无能。一个群众运动所取得的直接结果，往往就是群众渴求的结果。他们没有被骗。

催生群众运动的知识分子的悲剧根源在于，不管他们有多么讴歌群体行动，本质上都是个人主义者。他们相信有个人幸福可言，相信个人判断和原动力的重要性。但一个群众运动一旦成形，权力就会落入那些不相信也不尊重个人者之手。他们会得势，主要不是因为漠视个人让他们敢于冷酷无情，而是因为他们的态度和群众的激情是完全一致的。

【注释】

[1] 作者这里所说的「言辞人」大体是指知识分子，而他所说的「心有不平」或「好斗」的「言辞人」，则是指鲁迅一类揭发社会黑暗、批评腐败政府不遗余力的知识分子。——译注

[2] 见第106节的各例子。

[3] G. E. G. Catlin, The Story of the Political Philosophers (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1939), p. 633.

[4] 梯也尔为法国历史学家与政治家，第三共和国之首任总统；雷米萨为法国作家兼政治家，他是梯也尔的拥护者，曾任外长。——译注

[5] Quoted by Alexis de Tocqueville, Recollections (New York: Macmillan Company, 1896), p. 331.

[6] 德国社会主义运动主要发言人，马克思的门徒。——译注

[7] Multatull, Max Fiavelaar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Inc., 1927), Introduction by D. H. Lawrence.

[8] Bertrand Russell, Proposed Roads to Freedom (New York: Blue Ribbon Books, 1931), Introduction, p. viii.

[9] Henry Thoreau, Walden, Modem Library edi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37), p. 70.

[10] 路德是在写给美因兹大主教的信中提到这个的。

[11] Quoted by Jerome Frank, Fate and Freedom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Inc., 1945), p. 281.

[12] Ibid, p. 133.

[13] “Reformation”,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14] René Fülpǒ Miller, Leaders, Dreamers and Rebels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1935), p. 85.

[15] Ernest Renan, Antichrist (Boston: Roberts Brothers, 1897), p. 245.

[16] Arnold J. 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 Abridgement by D. C. Somervell (Toront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7), p. 423.

[17] Carlton J. H. Hayes,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Modem Nationalism (New York: R. R. Smith, 1931), p. 294.

[18] 德国哲学家，著有《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鼓吹德意志统一。——译注

[19] 奥地利犹太人，犹太复国主义创始者。——译注

[20] 指甘地，年轻的他在南非工作时曾因为不是白人而一再受辱。——译注

[21] Pascal, Pensées.

[22] 一个荷兰银行家在1914年这样说「我们不想成为烈士的心理并不比大部分想壮烈成仁的现代人强。」转引自Dcmaree Bess, “The Bitter Fate of Holland”，Saturday Evening Post, Feb. 1, 1941.

[23] 基督宗教认为，基督再临会带来千禧年，但在千禧年展开前世界会先经历一次大崩坏。这里的「基督再临指日可待」侧重于「世界大崩坏指日可待」之义。——译注

[24] William Butler Yeats, “The Second Coming”, Collected Poems (New York: Macmillan Company, 1933).

[25] 见第27节。

[26] Fëdor Dostoyevsky, The Brothers Karamazov, Book V, Chap. 5.

第二章 狂热者

如果狂热者是鱼，混乱就是水。当旧秩序开始崩溃，他会全力搅和进来，对可憎的「现在」施以猛烈无情的打击。他为一个世界突然走到末日而雀跃不已。让改革见鬼去吧！现存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是垃圾，而改革垃圾是了无意义的。

110 | 如果狂热者是鱼，混乱就是水

即使各种条件成熟，也只有狂热者才能使一个群众运动孵化成形。没有他，言辞人所激起的不满情绪将不会有方向感，只能漫无目的地宣泄，很容易就可以镇压下来。没有狂热者的领导，已经提出来的改革即使十分彻底，仍然动不了旧生活方式的一根毫毛，而政府方面即使有任何改变，也不过意味着权力从一批行动人转移给另一批人。没有狂热者，大概就会有一个新开始。

等旧秩序开始瓦解，那些一直焚香祝祷这一天早日来临的言辞人反而会害怕起来。乍见无政府的混乱状态，他们就会吓得不知所措。他们会忘了自己为「贫穷单纯民众」所说过的一切话，而跑去求助于强有力的行动人——亲王、将军、行政官、银行家、地主这一类懂得怎样应付乌合之众、怎样阻遏混乱怒潮的人。

狂热者却不是这个样子。如果狂热者是鱼，混乱就是水。当旧秩序开始崩溃，他会全力搅和进来，对可憎的「现在」施以猛烈无情的打击。他为一个世界突然走到末日而雀跃不已。让改革见鬼去吧！现存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是垃圾，而改革垃圾是了无意义的。对自己一心一意制造的混乱状态，他有一个自圆其说的解释：没有破坏就不会有建设。他会把怕事的言辞人推到一边，不过还是会继续宣扬言辞人提出的主张和口号。只有他一个人知道群众内心深处的渴望：渴望联合，渴望团结，渴望在一个庄严雄伟的有力整体中分解掉该死的个体。「未来」高于一切，在运动内外迷恋「现在」的人都合该受诅咒。

111 | 大部分的纳粹头子都有艺术和文学上的野心，却没有实现的能力

狂热者是打哪儿来的？大部分来自没有创造力的言辞人中间。言辞人内部有一个重要分野：一是创造欲望得到满足者，一是创造欲望得不到满足者。有创造力的言辞人，不管他对既有秩序的批评和嘲讽有多猛烈，都是依恋着「现在」的。他的激情在于改革而非摧毁。如果一个群众运动能始终为他掌控，就会被导向一个温和的方向。他发起的改革会是表面的，不会让日常生活的运转突然中断。但这只在群

众的行动还没有失控的情况下才有可能（群众的行动会没有失控，这或者是因为旧秩序不经斗争即行退让，或者是因为混乱甫一开始言辞人就与强有力的行动人结盟）。但如果对旧秩序的斗争呈现炽烈混乱的局面，而且只有凭借坚强团结和自我牺牲才可望取得胜利时，那些有创造力的言辞人就会被推到一边，权力会落入没有创造力的言辞人手上。后者乃是一些狂热鄙夷「现在」的人。[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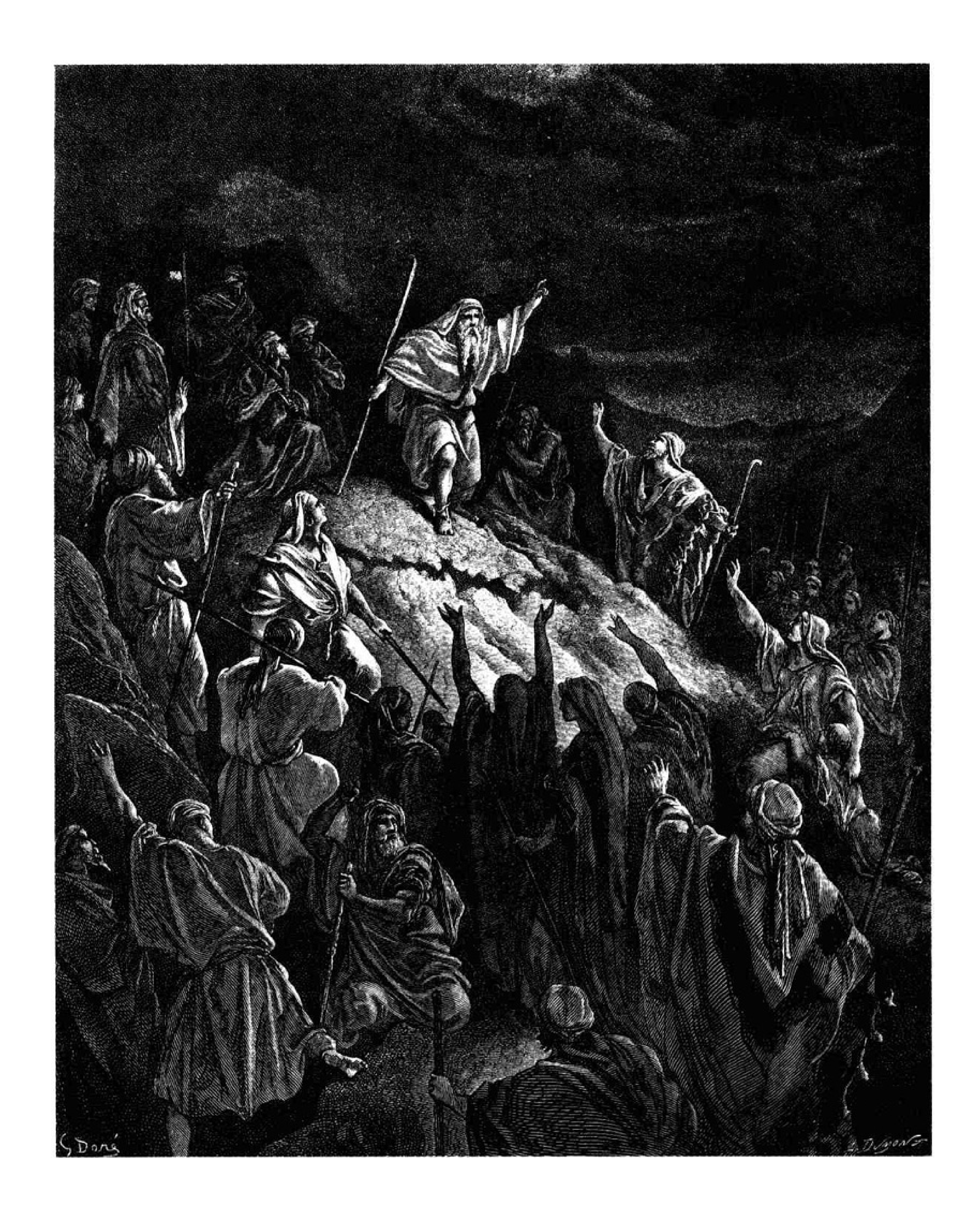
那种渴望写一部巨著、画一幅名画、设计一座雄伟建筑而又知道自己一辈子都办不到的人，只要是生活在安定的社会，就不会得到内心的宁静。他认为自己的人生已败坏得无可挽回，而世界则已经乱了套。只有混乱状态会让他如鱼得水。即使是服从或施加一种铁的纪律，他也只是把这纪律当成带来永远变动不居状态的工具。只有在投身于变动中，他才会有自由感，才会觉得自己在成长在发展。因为永远无法与自我取得和谐，所以他害怕确定，害怕固定的秩序。马拉（Marat）[2]、罗伯斯庇尔、列宁、墨索里尼和希特勒都是由无创造力的言辞人蜕变为狂热者的。菲尔埃克（Peter Viereck）指出，大部分的纳粹头子都有艺术和文学上的野心，却没有实现的能力。希特勒试过搞绘画和建筑，戈培尔写过戏剧，罗森贝格（Rosenberg）试过建筑和哲学，席拉赫（von Schirach）写过诗，丰克（Funk）试过音乐，施特赖歇尔（Streicher）试过绘画。「他们大部分都是失败者——不只从世俗的成败标准衡量是这样，从他们自己的艺术标准衡量也是这样。」他们的艺术野心「本来要比他们的政治野心深邃得多；是他们人格不可分的一部分」。[3]

有创造力的言辞人会觉得自己跟一个激烈运动的气氛格格不入。让人头晕目眩的变迁会腐蚀他的创造力。只要他的才华还没有枯竭，他就不会把满足感寄托在领导百万人和取得胜利上。结果就是，当一个运动全速开动以后，他不是会自动退出就是会被推到一旁。再者，由于真正的言辞人不会愿意长时间压抑自己的批判意识，日子一久，他无可避免会扮演起异端角色。因此，除非他能适时与操实权的行动人联合起来或早早寿终正寝，他的最后下场很可能是引退、被放逐或遭到枪决。

112 | 没有外敌可以摧毁时，同一阵营的狂热者就会彼此为敌

对一个群众运动的发展来说，狂热者的危险处在于他永远静不下来。一旦取得胜利，新秩序开始成形，狂热者就可能会成为一个乱源。对强烈情绪的爱好会驱策他去寻找尚未揭示的奥秘和尚未打开的神秘门户。他会不断走向极端。因此，大部分群众运动在取得胜利的第二天，就会出现内部倾轧。前一天在与外部敌人生死斗争中获得发泄的激情，现在会通过斗争自己人来宣泄。憎恨成了一种习惯。没有外敌可以摧毁时，同一阵营的狂热者就会彼此为敌。希特勒本身是个狂热者，所以对党内那些反对他的狂热者的心理状态有精准判断。1934年清算掉罗姆（Röhm）以后，他在写给新任冲锋队队长的任命状中指出，那些无法静下来的分子「没有了解到，他们已经把虚无主义当成终极的信仰……他们只能在阴谋活动中得到内心的安宁，在不断企图破坏既有的秩序中获得满足」[4]。希特勒对德国内外敌人的分析常常是一种自我披露，这段话也不例外。事实上，他一直都把虚无主义奉作他的「终极哲学与告别词」[5]，尤以人生最后一段日子为然。

若放任狂热者自行其是，他们有可能会分裂出去，对运动本身构成威胁。即使狂热者没有制造不和，他们仍会对运动构成危害，因为他会迫使运动去做一些不可能达成的事。只有务实的行动人介入，一个群众运动才可望保有它已取得的成果。



【注释】

[1] 见第37节。

[2] 法国大革命时期最激进一派的代表人物。——译注

[3] Peter Viereck, Metapolitic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41), pp. 156 and 170.

[4] Hans Bemd Gisevius, To the Bitter En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47), pp. 121-122.

[5] H. R. Trevor-Roper, The Last Days of Hitler (New York: Macmillan Company, 1947), p. 4.

第三章 务实的行动人

群众运动到了行动人手中之后，就不再是逃避个人生存苦恼和负担的人的避难所，而是一变而为野心家自我实现的工具。到了这个阶段，它会对那些有事业野心的人发挥强大吸引力，而有事业野心的人纷纷投效，也会激烈改变这个群众运动的性格，带来它与「现在」的和解。

113 | 用失意者的愤懑情绪作为建筑一个新世界的灰泥

一个群众运动一般都是由言辞人为前驱，由狂热者实现，再由行动人加以巩固。

如果这三种角色由不同的人接连担任，对一个群众运动来说通常都有好处；而一个群众运动想要长久存在，大概更是非如此不可。群众运动若是从开始到成熟都是由同一个人或同一批人领导，往往不会有好下场。纳粹和法西斯运动就是从头到尾都由一个人领导，所以下场凄惨。让纳粹运动走向败亡的，乃是希特勒的狂热无法抑制、无法扮演务实的行动人。要是希特勒死于1930年代中叶，则像戈林这样的行动人无疑将会掌权，这样的话，纳粹运动说不定可以继续生存下去。

人的性格当然是有可能改变的。一个言辞人有可能变成真正的狂热者或务实的行动人。然而，有各种证据显示，这种变形往往是一时的，或迟或早他们又会变回原来的类型。托洛茨基本质上是个言辞人：虚荣心重、才气焕发，而且是个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者。沙皇俄国的突然崩溃和列宁的坚强意志把他拉进了狂热者的阵营。内战期间，托洛茨基又表现出他是个无与伦比的组织者与将军。但到内战结束，局势缓和下来以后，他再度回复言辞人的本性。他不冷酷也没有猜疑心，信赖言辞的力量多于权力的力量，所以最后只能被狡诈的狂热者斯大林推到一边。

斯大林是狂热者和行动人的结合体，但狂热者的成分占优势。他犯下的重大错误（如消灭富农，清党，与希特勒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粗暴地限制作家、艺术家和科学家的创作自由），都是狂热者的表现。在狂热者斯大林当权期间，俄国人鲜能享受到「现在」的快乐滋味。

希特勒也是如此。他主要是个狂热者，而他的狂热损害了他以行动人身份取得的很多杰出成就。

当然也有像林肯、甘地、罗斯福、丘吉尔和尼赫鲁一类卓越的领袖，不过为数甚少。他们不迟疑于利用人的饥渴和恐惧去团结人民，使他们愿意为一件神圣伟业抛头颅、洒热血。但不同于希特勒和斯大林，甚至不同于路德和加尔文[1]的是，他们并不打算用失意者的愤懑

情绪作为建筑一个新世界的灰泥。这些卓越领袖的自信来自对人类的信心，因为他们知道，一个人除非尊敬人类，否则就不会受人类尊敬。

114 | 真正的行动人意不在更新世界，而在拥有它

行动人可以把群众运动从自取灭亡的分裂和狂热者鲁莽的行动中挽救回来。但他的出现，往往标志着一个群众运动活力期的终结。与「现在」的战争过去了。真正的行动人意不在更新世界，而在拥有它。群众运动活力阶段的生命力来自对抗和彻底改革的渴望，但最后阶段关心的主要是制度化和维系业已赢得的权力。

随着行动人的出现，该运动生龙活虎的活力会被封存到制度化的机构里面。一个宗教运动会凝结为僧团系统和一些仪式；一个革命运动会凝结为侦查和行政的机构；一个民族主义运动会凝结为一些政府和爱国主义的机构。一个教会的建制化意味着复兴精神的终结；一个成功革命所建立的制度会让革命的心态和行事方法被取缔；一旦一个国家建立复兴，其政府机构会让沙文主义的好斗性销声匿迹。这些机构把群众行动冻结成固定的模式。制度化集合体的成员被期望同心戮力，但他们却必然更像是松散的组合而非自发的融合。他们的团结只能来自对各制度本身的忠诚。自动自发会受到猜疑，谨守职分会被看成比热烈献身更高的价值。

115 | 行动人用以巩固和维系新秩序的方法是折衷性的

当一个行动人接管了一个得势的群众运动以后，其首要关心是把成员的团结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维持下去。他的理想是一个紧密无间和无懈可击的整体，可以自行运作。要达到这个目标，他不能依靠热情，因为热情是短暂的。说服手段的效果同样缺乏保证。因此，他会倾向于倚重强制手段。他觉得「所有人都是蠢材」之说不及「所有人都是懦夫」来得真确，所以他会赞同梅纳德爵士（Sir John Maynard）所说的：新秩序应该建立在人的脖子上而不是心坎里。[2]真正的行动人不是信仰人（men of faith），而是法律人（men of law）。

尽管如此，信仰与自发性在运动初期所发挥过的重大作用，仍然会让他记忆犹新。因此，他还是会在新的机构里保持信仰的门面，并

继续不间断进行热烈的宣传，哪怕他依赖的主要是强制手段。他的命令都会用虔诚的语汇加以包装，往日的纲领和口号仍然会挂在嘴边。信仰的象征物高高挂起，备受尊崇。运动早期阶段发挥过作用的言辞人和狂热者会被奉为圣徒。这样，就会营造出信徒的服从是出于信仰和自发的假象。他也会尽全力把新秩序说成是早期斗争所追求的理想的辉煌实现。

行动人用以巩固和维系新秩序的方法是折衷性的。他取法的对象不论远近，无分友敌。他甚至会向旧秩序取经，抄袭很多旧秩序用以维持稳定的方法，因而不知不觉地建立起与过去的连贯性。这阶段的一大特征是会出现一个绝对的独裁者，但之所以会这样，并不纯粹是当权者嗜权，这也是一种蓄意采用的策略。

极端独裁看来在一个组织的诞生阶段和衰落阶段都是最容易出现的，因为它可以让尚未定形的东西定形，或让行将解体的东西暂时稳住。例如，「教皇无错误说」是伊里奈乌斯（Irenaeus）[3]在教皇初创期提出的，但到了1870年，也就是教皇制度看来摇摇欲坠的时候，庇护九世（Pius IX）又把它重提一遍。

因此，由一个行动人所建立的秩序是一种拉杂拼凑之物。例如，斯大林治下的俄国就是由布尔什维克主义、沙皇制度、民族主义、泛斯拉夫主义、独占资本主义杂凑而成。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则集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普鲁士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日本神道主义、天主教成分和古代希伯来信仰于一身。

基督宗教的情况也类似，它在经历最初几世纪的内部冲突和分裂后，凝固成了一个专制的教会，其成分也是新旧杂陈和从敌友两方面抄袭而来。例如，它的科层制度是模仿罗马帝国的官僚系统，仪式部分则吸取了古代信仰并采自古代礼仪，又发展出绝对领袖制度，并用尽一切方法把所有生命与权力的成分吸收进来。[4]

116 | 一个群众运动的活跃阶段结束，就会变成成功者的权力工具和失意者的鸦片

群众运动到了行动人手中之后，就不再是逃避个人生存苦恼和负担的人的避难所，而是一变而为野心家自我实现的工具。到了这个阶段，它会对那些有事业野心的人发挥强大吸引力，而有事业野心的人

纷纷投效，也会激烈改变这个群众运动的性格，带来它与「现在」的和解。早在纳粹党还嗷嗷待哺时，希特勒已经洞悉群众运动的特质，并提出警告说，一个群众运动想要始终保持活力，就绝不能提供任何「现在」的好处，而只能鼓励追随者向往「后代子孙眼中的光荣和声望」。希特勒指出，一旦群众运动被一些喜好功名利禄者入侵，它的「『使命』就寿终正寝了」。[5]

到了这个阶段，群众运动仍然会对失意者下工夫，但不是去煽动他们的不满，使之继续与「现在」作殊死斗争，而是千方百计使他们与「现在」和解，变得忍耐而柔顺。这时候，群众运动会提供失意者遥远的希望、梦想与愿景。[6]等一个群众运动的活跃阶段结束，它就会变成成功者的权力工具和失意者的鸦片。

【注释】

[1] 路德和加尔文两人都「志在建立一个比天主教会更强有力、更独裁、更苛求、更不倦于迫害异端的新教会权威」。

[2] John Maynard, Russia in Flux (London: Victor Collancz, Ltd., 1941), p. 19.

[3] 2世纪的基督宗教神学家。——译注

[4] John Addington Symonds, The Fine Art “Renaissance in Italy” series (London: Smith, Elder & Company, 1906), pp. 19-20.

[5] Adolph Hiller, Mein Kampf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43), p. 105.

[6] 见第25节。

阿里 Mehmed Ali
埃里克·霍弗 Eric Hoffer
艾梅·麦克弗生 Aimee McPherson
巴拉巴诺夫 Balabanoff
班扬 Bunyan
保罗 Paul
柏格森 Henri Bergson
柏克 Burke
白芝浩 Bagehot
比尔德 Miriam Beard
布哈林 Bukharin
布克哈特 Burckhardt
茨温利 Zwingli
德尔图良 Tertullian
德瓦莱拉 De Valera
迪穆里埃 Dumouriez
菲尔埃克 Peter Viereck
费雷诺 Ferrero
费希特 Fichte
福格特 F. A. Voigt
丰克 Funk
格劳科斯 Glaucus
戈林 Goering
戈培尔博士 Goebbels
哈登贝格 Hardenberg
赫茨尔 Theodor Herzl
赫拉克利特 Heraclitus
赫斯 Rudolph Hess
赫胥黎 Julian Huxley

胡斯 John Huss
霍尔丹 J. B. S. Haldane
霍米亚科夫 Khomiakov
基诺夫 Kirov
吉洪 Tihon
加塞特 Ortega y Gasset
卡尔文·汤姆金斯 Calvin Tomkins
凯末尔 Kemal Ataturk
凯斯特勒 Koestler
克劳迪安 Claudian
克罗斯曼 Richard Crossman
克伦威尔 Oliver Cromwell
拉狄克 Karl Radek
拉罗什富科公爵 Due de La Rochefoucauld
拉萨尔 Lassalle
拉斯柯尼科夫 Raskolnikov
赖德烈 K. S. Latourette
劳施宁 Hermann Rauschning
勒南 Ernest Renan
勒姆 Röhm
雷米萨 de Rémusat
利奥十三世 Leo XIII
列宁 Lenin
罗伯斯庇尔 Robespierre
罗森贝格 Rosenberg
罗伊希林 Johann Reuchlin
马拉 Marat
梅兰希通 Melanchthon
梅纳德爵士 Sir John Maynard
蒙田 Montaigne
弥尔顿 Milton
墨索里尼 Mussolini
尼科尔森 Harold Nicolson

帕拉茨基 Palacky
帕斯卡尔 Pascal
丘吉尔 Churchill
萨耳珀冬 Sarpedon
圣伯尔纳 St. Bernard
圣多米尼克 St. Dominic
斯大林 Stalin
斯塔埃尔夫人 Madame de Staël
斯特来斯曼 Stresemann
施特赖歇尔 Streicher
梭罗 Thoreau
汤因比 A. J. Toynbee
梯也尔 Thiers
铁托 Tito
托克维尔 Tocqueville
托洛茨基 Trotsky
陀思妥耶夫斯基 Fëdor Dostoyevsky
魏茨曼 Chaim Weizmann
韦尔斯 H. G. Wells
西洛内 Silone
西蒙诺夫 Konstantine Simonov
希特勒 Adolf Hitler
席拉赫 von Schirach
休谟 David Hume
雅各布 Jacob
叶芝 Yeats
伊里奈乌斯 Irenaeus
约伯 Job
约书亚 Joshua

1、本电子书由“JinE（精益）制作组”制作。

2、“lafuers”完成对扫描版的OCR；由“lafuers”、“Temperance”、“一张xx”、“xopher”、“SYOULT”共同完成校对。

3、bookworm用EpubStar软件转换为Epub格式，并用Sigil对Epub进行了样式调整。

4、如报告勘误信息或查询本书版本更新情况,请访问“JinE（精益）制作组”官方网站（www.jebook.org），如对电子书制作技术有兴趣，欢迎与“JinE（精益）制作组”联系。

5、本电子书制作目的系为学习及交流Ebook制作技术，请下载者在24小时内删除，如对本书有兴趣，请购买正版图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狂热分子：码头工人哲学家的沉思录/（美）霍弗著；梁永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4
ISBN 978-7-5633-7462-5
I. 狂… II. ①霍…②梁… III. 群众运动-研究 IV. D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39875号

狂热分子：码头工人哲学家的沉思录

[美]埃里克·霍弗（Eric Hoffer）　著
梁永安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版　　次：2008年4月第1版
　　　　　2008年4月第1次印刷
开　　本：960mm×1300mm 1/32 印张：6.75
字　　数：110千字
印　　数：0,001—10,000册
定　　价：20.00元



制作信息

排版制作：JinE（精益）制作组
排版样式：老牛样式bookworm修改版 (2013-02-22)
制作版本：1.2
制作时间：2013年2月8日
更新时间：2013年3月11日

制作软件

EpubSTAR Pro [beta] 3.0.0.30203

狂热分子

码头工人哲学家的沉思录

风行半个世纪的群众运动圣经

失业者宁愿追随贩卖希望的人，而不愿追随施予救济的人。

社会低等成员之所以能对社会发生重大影响，是因为他们对「现在」完全不尊重。群众运动不需要相信有上帝，一样可以兴起和传播，但它却不能不相信有魔鬼。一个有力的群众运动会培养其追随者的罪恶感。它不但会把人的自主「自我」形容为贫乏和无助的，还会把它说成是罪孽深重。悔罪的方法是抛弃个人的特殊性和独立性，得救的方法是把自我掩埋在团体的神圣一体性中。

当我们在群众运动中丧失了自我独立性，我们就得到一种新自由，一种无愧无疚地去恨、去恫吓、去撒谎、去凌虐、去背叛的自由。这毫无疑问是群众运动的部分吸引力之所寄。在群众运动中，我们获得了「干下流勾当的权利」。